

## 序言 巨大的文化板块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文化经受了民权运动，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人的先后遇刺，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等动乱。虽然这些动乱及其他事件构成了当时新闻媒介报导的中心，可我们的社会调查表明，这一切并未冲击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几乎没有触及到他们的人生观。然而近年来，新闻媒介却大肆宣传我们已经回到了 50 年代的生活秩序：宁静的校园中，衣冠楚楚的青年人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而不是改变现行政体；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如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自由放任的社会态度，回复到更加保守的价值观。我们所做的调查向我们显示了文化上的惊人变化。这些变化范围极其广泛。从一些外缘性的变化 如不再愿意使用 8 缸

引擎老式汽车，饭前喝白葡萄酒而不喝烈性酒等，到那些深入美国人生活核心的变化，即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入到家庭生活、工作、学习、宗教、邻里关系等半社会活动，以及作为公民的社会活动中。

每当我面对如此广泛的变化时，脑子里总要不断地浮现出一个影像：地球在地面下移动，从而改变了地球的风貌，使其失去了昔日人们熟悉的一切。根据地质学板块构造理论，巨大的“板块”支撑着地球的表面，使其稳定而且坚硬。有时候，这些巨大的地质结构由于在地表下相互挤压而产生位移。这种位移也许很轻微，但由于板块太庞大了，因而即便是沿着断层面出现极其微弱的位移，也会在地球表面引起火山爆发和地震。

近年来，我们的社会研究日益表明，美国文化这个“巨大的板块”正在我们的脚下不停地移动着，这种移动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那些离社会的断层界面最近的人，便首当其冲地被抛入新的困境之中。但是，即便是那些离得很远的人，也感觉到了“板块位移”带来的震动。

文化上的“板块位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70年代，每年有100万左右的美国人做绝育手

术，因而 10 年当中，就有 1000 万人确信自己不会生儿育女了。在美国这样一个现在似乎反对人人必须履行生物职责的社会里，这只是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原因。以每个育龄妇女可生 1.7 个孩子来计算，我们已低于不使人口收缩的 2.2 零人口增长率<sup>①</sup>，更大大低于 50 年代的 3.7 人口增长率。我们调查表明，数以千万计的美国妇女今天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把生儿育女看作是自我实现的途径。大规模的、有意识的绝育是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做的一种新的尝试。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变化中，恐怕要首推家庭组成的变化了。50 年代，由外出做工的父亲，在家料理家务的母亲，以及一至两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70%。这就是合乎当时规范的、人们熟悉的所谓“核心家庭”。大多数美国人一旦得知，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内，这种规范就被破坏到如此程度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典型的美国家庭”今天非但不是主要的模式，而且也不是数目较大的少数，它现在只占家庭总数的 15%。如今，“典型的美国家庭”比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少。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单身者家庭是发展最快的一种家庭类型。

这种家庭从 50 年代占家庭总数的 10.9% 发展到 70 年代末的 23%。我们已经从一个由单一形式，即由丈夫养家活口的核心家庭形式主宰的社会，转变为存在多种家庭形式、但没有那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多样化的社会。

位于田纳西州的通用汽车公司，向其工会——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提供了 50 份管理工作的优先就业机会，如看门，清扫，日常维修等。公司期望有 10 至 20 名申请人是来自那些还未到退休年龄，但已被长年的工作累得精疲力尽的、正在寻找一份轻闲工作的老工人。但使工会与厂方吃惊的是，他们得到的申请表既不是 10 份，也不是 20 份，而竟然是 2000 份，并且申请人大多是已经有了高工资、高地位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还远远不到退休年龄。工会不知如何分配这 50 份工作。年资高待遇就应该高，这样的权利思想原是想攀登高位的心理引起的。有谁曾听说过竟有人指望得到一份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呢？

劳动大军的组成也在发生变化。20 多年前，典型的工人是那些为养家活口而全天干活的人。今天，符合这个标准的工人不到为工资干活的工人总数的 1/5。到 70 年代末，大多数妇女 (51%) 外出工作。

到 1980 年，约有 1/5 以上的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在为工资而工作。在年收入为 25000 美元以上的家庭中，大多数是靠夫妻双方的收入维持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当妇女吵嚷着要加入到劳动大军中去的时候，男人却慢慢地退了出来。在 1947 到 1977 年的 30 年间，处于最佳工作年龄（16 岁到 65 岁）但离开了劳动大军的男子数量已从 13% 增加到 22%，几乎翻了一番。

对大多数工作做出的安排依然如旧，就好象这些变化根本没有发生似的。这些工作仍然是每周 5 天，按时上下班的全日制工作。工资与小额优惠的发放标准，仍然是依据把雇员看作是家庭的唯一挣钱者这样一个设想制定的。我们可以想象，到将来在如何组织工资支付以及照顾儿童与保健方面，会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

1978 年，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念书的妇女比男人多，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个趋势反映出妇女在受教育程度、职业训练和就业机会上，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决心。但是，这种趋势也反映出，男性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在下降。这跟第二次世

小额优惠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雇主给雇员的养老金、假日工资之类的小恩小惠。——译者

界大战战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对于许多美国男青年来说，上大学已不再是走向成功的捷径。当然，这种成功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成功。

1970 年，我公司对美国的文化潮流进行了多次调查，结果表明，几乎有  $2/5$  的美国人持有“酸葡萄”的人生观。这些人做着“美国之梦”，相信只要通过接受教育、赚钱、获得财富、受到他人的赏识、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等等，就可以使自己出人头地。可是在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梦想完全破灭了。我的助手，弗洛伦斯和斯凯利把这些人称为“逃避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感到生活困苦，进而产生了消极、孤独的情绪。在这些逃避者中，多数是年纪不轻的人。他们的中间年龄为 53 岁，而就整个人口而言，中间年龄为 28 岁。令人震惊的是，10 年以后，“逃避者”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从 38% 减少到 18%。这反映了美国人生活中的若干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不如以前那么激烈；一般的美国人已不再把成功定义为“赶上琼斯家”<sup>①</sup>了。与 1970 年相比，现在的美国人很少用竞争成功的标准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否顺利。因此，这种

① “赶上琼斯家”指在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上赶上他人 ——译者

在经济上没能赶上他人的失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使人感到耻辱的污点了。

密西根大学的调查向我们显示出另外一种变化。年龄偏大的美国人，已不象以前那样痛苦、忧虑和抑郁了。可是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变得越来越烦恼、忧虑、情绪也不稳定和没有奋斗的目标。<sup>①</sup> 扬克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的研究也表明，当老一辈的“逃避者”逐渐减少时，新的不安情绪正在年轻人中间蔓延。在过去的几年中，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同时感到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数目，每年都有增无减。直到几年前，我还在设想，这些变化不过是美国文化对新情况作出的适应性变化罢了。变化是我们期望于美国历史的一个常数。然而尽管有了所有这些变化，美国文化中的某些主题却一代二代地传了下来。1923年，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与海伦·林德在印第安纳州的芒西县，对米多尔镇进行了一次典型的社会调查。191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资助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小组，重复这项已经中断了50年的社会研究。林德夫妇把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现，同19世纪80至90年代芒西县

① 见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1979年出版的ISR通讯第1卷第1期

的生活进行了比较。而这个社会科研小组则是在林德夫妇的工作基础上，对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美国人的生活作了考察。

经过调查，这个小组的成员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来说明 70 年代发生在芒西县内的文化变化，如离婚率增高、吸毒、公开的色情画与色情文学、更大的容忍性等。但是，对他们震动最大的并不是变化，而是持续不变。在社会动荡中，他们惊讶地发现，1977 年芒西县的高中学生对某些问题所做的回答，与他们的祖父母在 20 年代向林德夫妇提供的回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人数的学生提到因晚上回家晚了与父母发生争吵的事；大多数学生说他们仍然把《圣经》看作是“完全可以解决现代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指南”。<sup>①</sup>

对芒西县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强调美国生活中的延续性，这不见得是错误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延续性一般多于变化性。一般说来，文化形式是会持续很久的。30 年来作为一个对美国人的风俗习惯、道德态度的研究者，我也更对延续性而不是变化性感到习惯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变

① 霍德华·M·波尔：《1924—1977，米多尔镇家庭生活中的变迁》。见《公众舆论季刊》，第 44 期，第 1 号（1980 年春季）第 24 页。

化趋势进行的研究，几乎每一次都向人们展示出这种令人惊叹的延续性。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延续性与影响深远的变化性确实是同时并存的。美国文化是如此的多样化，以致任何一位试图突出其延续性的观察家都不难实现他的愿望。相反，任何一位试图对美国人生活中的变化做一番纪实性描述的观察家，也是自有办法的。要回答的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一如既往呢，还是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已经改变，如我们的调查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就会象洪水一样冲破文化的禁锢，涌进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来。从表面上看，芒西县和其他典型的美国城镇的生活尽管仍然以人们熟悉的方式持续着，但如果这些变化很大，它们就肯定会打破美国文化的延续性。

我在本书将着重探讨的美国人生活方式上所发生的变化，就是很重大的变化。它们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而且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命运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亦会大有影响。

## 二

我在本书里所要讲的是关于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别的表现形式——追求自我实现，以及这种追求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的困境。

这些困境对于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令人恼怒的。它们涉及到家庭的破裂，频繁地调换工作和更换居住地，无休止地反复思考着个人的内心需求和未经挖掘的潜力。这种追求自我实现的道德标准，抛弃了许多传统的行为准则。例如，它们允许更大的性自由，不看重无实际意义的牺牲。坚定的自我实现追求者遵循的道德标准，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古脑儿地抛在一边。但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人恰好相反，他们对什么也不克制了。这不是出于贪得无厌，而是基于一种奇怪的道德标准，即“我要对我自己尽责”。

尽管追求自我实现有许多令人恼怒的特点，但它们并不象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是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沉醉的发泄。这些行为自然是由于过多的财富而变得颓废所造成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许多美国人确实是一心只想着自己，但是，以自我为中心也许只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一个附带的特点，是一个从盲目地反对旧观念到综合新旧观念的过渡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象有些观察家坚持认为的那样，追求自我实现，证明了美国人的性格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变化。社会特性并非一朝一夕说变就变，

它在 10 年、甚至 20 年里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米多尔镇的研究者们在社会延续性方面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在短暂的岁月里发生变化的是文化的象征及其意义。在本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期这短短的时期里，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用从“流行心理学”那里借用的语言，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什么需要“继续成长”，急于发挥个人的“潜力”，使自己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人”，等等。但是这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却是从一个什么是自我、以及应该怎样去实现自我的极其狭隘的观念中引伸出来的。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将要剖析的那样，业已显示出减色的迹象。我们会更好地懂得，为什么只关心自我事实上既没有反映出美国文化中持续的变化，也不是美国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真正寻找的东西。只关心自我是朝着对社会和对个人来说都同样重要的目标前进时偏离了正道，而且也是一个冒进的开端。

由于富裕的生活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观察家便得出结论说，当今社会不景气产生的压力，会迫使文化回复到生活不太富裕的那段时期所盛行的传统中去。但是，调查的结果表明，他们断言要发生的事情并未发生。毫无疑问，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人会变得谨小慎微。由于就业机会不多，雇员就会对自我发泄的要求有所收

敛，而不象在就业机会多时那样随心所欲。我们的调查表明，在过去的 10 年里，对金钱的要求，比对“有趣的工作”的要求更为强烈。

但是，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並不是象摇摇玩具 ( $y_0$ — $y_0$ ) 那样顺着经济的绳索上上下下地来回滑动。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旦挣脱了身上的锁链，就会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例如，妇女加入劳动大军，既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出于要在经济上独立的动机。她们并不认为，依靠丈夫的薪水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是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选择。在 80 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这些妇女並未因此返回厨房，相反，当她们发现需要她们对家庭的收入做出贡献以达到收支平衡时，她们那种外出工作的信念还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同工同酬的政治压力也在增大。而且在此时期，黑人、其他有色人种、年轻人、以及由于经济原因而不能退休的老人，为了就业，竞争得更加激烈，使社会陷入带来一连串新问题的漩涡之中。文化、政治、经济这三种压力交织在一起，並不能明显地把我们带回到过去那种有条不紊的状况以及各自为政的生活中去。文化“板块”一旦移动便是不会复位的。

自我实现並非只是因为生活富裕，或者是国家的特征朝着自我陶醉方向转化时产生的一种副产

品，而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重大、更加不可逆转的现象。它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美国人生观。虽然这种新的人生观常常令人发狂，但它也许比战后盛行的消费者的价值观更能适应我们大家所面对的经济现实。那些以大型轿车、豪华住宅、以及不断上升的薪水等标准来衡量自我价值的人，在经济繁荣时期干得比较成功。他们的这种成功标志是有形的，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那些用不太有形的成功标志来衡量自己价值的人，当他们的收入跟不上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时，都能在生活中更多的方面得到满足。

但是，这个正在露面的人生哲学，远远不是为不景气的经济寻找一付安慰剂，而是为今后过上好日子打下基础。它为复苏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它所寻求的目标比过去那些仅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来衡量的目标更加广阔。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的人生哲学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够迎接更为广阔的人生。不过受其影响，美国人会变得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並做好准备迎接向文明提出挑战的艰难抉择。

我们不习惯于认定变化中的社会价值观念能影响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但我们最好学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因为我们遇到的多数困扰，以及排

除困扰的方法都来源于我们的这种不习惯。一般说来，我们期待着用经济、技术或政治手段来改变我们的命运。然而，我想表明的是，完全依赖政治与经济前景来预测我们的未来，难免不使我们感到悲观，甚至绝望，但依赖文化前景——我们共同遵循的社会价值观念——来预测未来，却能意想不到地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往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

围绕追求自我实现这一现象，我将在本书考查：这种追求如何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得以表现出来；通货膨胀及其他经济状况如何影响这种追求，並受其影响；自我实现的追求者如何在 70 年代寻求一种自我毁灭的策略；美国人在 80 年代又是怎样学会把错误的、毁灭性的策略同正确的、与诞生不久的新世界相适应的策略区分开来的。

本书並不是一本自助性著作，它没有开出什么济世良方，也不想告诉人们如何去生活。但是，如果那些在自我实现的追求中不能自拔的人，未能通过本书得到一些新的、如何展望自己未来的启示，我将感到遗憾。

我相信，在当今这个世界里，为自我实现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的开路先锋，它将把我们的工业化文明引向人类活动的一个新阶段。

## 第 1 章

## 导言：一个问题

西方文学和历史充满了自我实现追求者的故事。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追求——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金钱，爱情，造反，英雄人物式的私通，以及寻求内心安宁，不断创新，或者仅仅是四处游逛等。无可讳言，他们冒险的背景，就是众多的默默无声的美国人的存在。这些众多的普通人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常生活，忙忙碌碌地操持着家务，勉强凑合地维持生活，去教堂做礼拜。然而，现代美国社会中出现的这股追求自我实现的潮流，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並不局限于几个铤而走险的人或某个特权阶级。相反，对美国社会进行的典型调查准确无误地表明，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民众感情的发

泄和尝试。多达 80% 的美国成年人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这种追求之中，可见声势之浩大，好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决定用自己唯一能够支配的东西——生命去孤注一掷。

他们所做的尝试是危险的。许多美国人以自我实现的名义铤而走险。可他们一旦醒悟过来，便会大吃一惊，发现自己要么婚姻破裂，要么错误地改变了职业，要么就是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尽管追求者们遭到了无数次的失败，可他们仍然在进行着尝试。我们这个时代所固有的一些特别的东西，刺激着美国人冒很大的危险去寻求美好人生的新概念。

生活方式的自发改变并不多见，这个现象或许从来就是如此的。一般说来，文化方面的新思想是以“预先包装”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意识层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从那些伟大的著作中读到这些新思想时，可能与此同时出现的徬徨、兴奋，以及错误的起步已经被“整理得有条不紊”了。一本思想史往往只记录少数杰出人物，如第一流的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那些以其精确或雄辩使他们的思想公式化了的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们的观点。但是，新的对生活及其意义的理解方式往往是从民众当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

当出现这种新思想时，我们最好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无组织的社会运动可以改变整个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但是到底应对什么给予注意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种变化本质往往被隐藏了起来，只现出一些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使人难以理出头绪来。

60 年代，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主要局限在美国大学生中间，而且带有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色彩。70 年代初期越南战争结束后，大学校园渐趋风平浪静，可是对传统观念的这一挑战却冲出了校园，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去寻找各种表现——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在消费者、环境与生活条件改善的运动中（“节约就是美德”），在对自助、地方观念和参与的强调中，在济贫运动中，在论自我修养的大量书籍中，在对科学技术世界观的怀疑与探索中，在对性行为（如裸体、婚外性生活、同性恋以及各种公开的性行为）的更大范围的接受中，在对自身形态美的一种新的追求中，在对自然与物质世界重新产生的兴趣中，尤其在对所谓的“充实、丰富的生活”的追求中。这种充满闲暇、体验与享受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循规蹈矩、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调查表明，人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他们问的不是那些在五六十年代一般的美国人喜欢